

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

Engende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主 编

蔡一平 王 政 杜芳琴

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

1999年8月 天津

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

Engende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主 编

蔡一平 王 政 杜芳琴

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

1999年8月 天津

鸣谢：

玛格丽特·辛克女士(Ms. Magraret Schinc)通过席勒·亚当斯(Shaler Adams Foundation)提供资助；

斯坦福大学凯瑞·欧芬教授(Professor Caren Offen)推荐部分阅读资料。

视角转换和方法革新： 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

——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综述（代序）

蔡一平

妇女史研究在我国有相当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在妇女研究背景下的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与国际妇女学和妇女史最新动态的“接轨”，不断从“他山之石”寻找、磨砺适于自己的工具，以推动我国的妇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1999年8月中旬在天津蓟县举办的“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该班汇集了来自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妇联系统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的近50名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紧紧围绕着妇女学和妇女史学科建设、妇女史理论方法和如何将国内外已有的理论、方法、经验运用于我们的研究实践这三个要点，在事先准备的近30篇文章和4本书阅读的基础上，分四个单元以读书报告、讨论质疑、讲座、看录像、个别交谈等方式开展研讨，开拓了学术视野，启发了思考，同时又提出了新问题，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认知。这里，对读书研讨要点综述如下：

（一）、妇女学学科建设：意义·概念·运作

当今的妇女史研究，如果脱离国际妇女学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单纯把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甚至仅把妇女史视为社会史的一支），无疑是一种视野和方法上的缺憾。所以，这次读书研讨班在讨论妇女史学科建设之前，首先讨论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

1、意义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教育和学科体系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延续的重要手段。在妇女研究开展较早的欧美国家,这种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结出硕果:大学开设数万门课程,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已经进入学术主流,并逐步改变着原有的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在我国,妇女研究尽管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步,但在学科化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妇女研究仍多属于“妇女问题”为主的课题、项目研究,这类研究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解释或改变妇女的具体现实处境上,从而忽略了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与传统知识结构进行对话和挑战这一更有战略意义的知识重构工作。于是,国内妇女研究领域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妇女问题研究和发展项目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妇女学科建设冷冷清清,开课的学校屈指可数,课程也很少,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也在各个学科孤军作战,有限的妇女研究中心也多忙于做项目,搞“发展”。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发展国家急切解决妇女问题的紧迫感,又有妇女研究的“后发性”了解外部信息的局限,还受到国际资金导向制约;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教育学术体制、妇女研究者自身对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意义认识、概念理解和具体运作缺乏认真探讨分不开。

在读书研讨中,通过总结国内外妇女学科建设的经验,大家认识到:妇女学学科建设,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建立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学术研究体制,系统地开设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培养从事这一领域研究、教学和社会需要的人才,并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1)为现实的妇女问题和发展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理论 and 学科背景框架;2)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妇女研究、教育、工作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3)通过在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对话和批判,改造传统的知识体系,从而建

立起新的性别文化。

2、概念与运作

在与妇女学学科建设有关的概念和如何运作方面,与会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

(1)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女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

八十年代中期从国外传来的 Women's Studies 被汉译为“妇女研究”,准确的译法应是“妇女学”。国外“妇女学中心”的任务是开设课程从事研究,而另设有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妇女研究中心”机构。有的学者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妇女学,当务之急应把“妇女学”从作为问题和课题的“妇女研究”中相对分离出来,使之进入学科领域,走上课堂。有人认为“妇女”这个词政治色彩太强,建议不用“妇女学”而用“女性学”;但同时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说“女性”易将妇女“生物学化”,掉进本质主义陷阱,像当今在一些妇女学校以“女性学”名义开设的课程多以“公关”、“文秘”、“家政”、“礼仪”、“美容”为主,就足应引起警惕。有学者还提出根据当前发展趋势,还是称作“妇女与社会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较好,其理由是:现在“社会性别”逐渐成为一个分析范畴,适用于所有学科范畴;而我们所理解的妇女学既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的新知识体系,又是需要张扬妇女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一称谓可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在国外,一些大学纷纷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所、系)”命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2)多学科与跨学科

与会者就美国学者玛丽莲·鲍克塞的新著《当妇女提出问题的时候》(1998)和她的文章《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1999)、《重新规划大学蓝图:培养妇女研究博士的前景》(1998)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她提出的妇女学追求的两个目标——“既尽可能深入而广泛地扎根于系科之中,又伸展出去参与适合妇女学知

识兴趣和具体体制结构的跨学科单位”，也就是说“同时参与学科和跨越界限”深表认同；但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都还没有更多的积累。许多学者认为分学科的用社会性别理论清理、挑战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打通既有学科分割改变既有的认知模式，建立一种社会性别视角，联系多种范畴视角的新的认知方式，既是紧迫的任务，又是可以同步进行的。（郑新蓉）

在具体的运作上，有学者提出，在原有学科中设置专门的分支学科或专业方向是符合国情的做法，比如，可以在历史学科中建立妇女史分支，或在传统的断代史和专门史中招收妇女史方向的研究生；在理论框架和方法上引进新视角新方法，挑战原来的学科，从边缘进入主流，有力的挑战一定能被主流接纳，边缘和主流不是绝对的（郑永福、邓小南）。有的学者还认为，挑战本身就是革新、颠覆和改造，经过一个个学科的加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反思，注入新的活力，就会发现原有的知识缺陷，需要综合，实现知识的交融和知识与人生的融合（周华山、郑新蓉）。可见，多学科的分头楔入和跨学科的整合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

（二）妇女史研究回顾：历程·理论·方法·范例

在明确了妇女学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读书研讨班集中时间探讨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先是对国内外以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理论贡献和论争、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例进行研讨。采取中外对照并以介绍国外经验为重点，用读书报告、小组讨论、全体分享、质疑答疑、专题讲座等方式深入每个议题。

1、历程：妇女史——社会性别史——差异的历史

从七十年代美国妇女史学家吉达·勒纳在《妇女史的挑战》中，将妇女史定义为“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重建女性历史的努力”（1976），到八十年代末斯科特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1988），以及鲍克在《妇女史和

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中正式提出“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的目标(1989)，直到九十年代斯科特主编《女性主义与历史》提出“差异”(difference)的重要性，指出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除了性别以外，还要注意因为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身份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差异同样是重要的(1996)……可以看出国外妇女史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变化，这一变化正是西方妇女史近30年来走过的历程，反映了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深化和研究实践的深入。正如鲍克所指出的：在开始“研究妇女史，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将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来考察……将妇女史从一般的历史中分开”；因为“妇女史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类断代一半，而是全部”，所以“社会性别”的新视角就要求研究者“转向不只关于妇女和妇女的问题，而是关于所有的历史问题……因此，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意味着普遍的历史也必须被看作是两性的历史：看作社会性别史。”(同上)而到了九十年代社会性别普遍被用于历史研究时，斯科特又提出了妇女身份认同(identity)差异的复杂性，就是将妇女置于多种社会范畴——包括国家、地区、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性倾向，把妇女间的“差异”作为女性主义史学的分析范畴，正是为了加深对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本质”的妇女被打碎了，身份各异的妇女在“差异”的基础上“结盟”以实现各自的目标。苏珊·维特妮的《透过社会性别的棱镜看历史》文章评介的4部妇女史著作，给大家提供了将社会性别与其它范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信仰、文化等)结合以及将“差异”(种族、阶级、国家、性别等)范畴运用于妇女史研究的新范本。

2、理论焦点：社会性别与生物学·社会性别中立话语·实证研究与实证主义

围绕妇女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核心理论问题，与会者在讨论中辩诘争论十分激烈。

将“社会性别”的概念引进历史研究的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受到“生物学”观点的影响。生物学观点认为,无论从社会性方面提出何等激进的“男女平等”的口号,生物学男女自然差异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妇女的自然性就是生育、抚养孩子、管理家务;另外,还有“男人味”和“女人味”——这不但被赋予是一种“天职”和“天性”,也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成为像种族歧视一样的性别歧视的理论根据。讨论中,不少人对目前流行的社会性别(gender)和生理性别(sex)的二分法表示困惑。正如鲍克指出的:将“社会性别”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的二分法和“生物决定论”都妨害用社会性别视角去研究历史,应该“用一种综合的方法使用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物学”的眼光来了解被文化构建的女人和男人的生活及这些生活以外的东西。鲍克的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有学者指出,生物学的性别观点从本世纪初引进,改革开放以来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像建构“女人是柔弱的”、心理特点如何如何,女性的天性是母性,而且作为科学来宣教,在妇女史研究中也难免受到影响——人们关注的,不是贤妻良母,就是后妃美女名妓(王政等)。鉴于生物学观点在我国的巨大市场和顽固定势,在今后妇女史研究中,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得以清理、克服。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人担心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是否会偏离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有人用画山来比喻——历史的真相就是云山雾罩的然而又是真实存在的“山”,研究者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发现、描摹这座“山”,也许永远难画出山的真面,但企图逼近“真实”,还是可能的;那么逼近真实的“法宝”就是“客观”“中立”。个别女学者更担心:站在女性的立场或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写史立传,是否离“真实”“客观”越来越远?在读书研讨中,通过大量事例、研究范例证明没有“纯客观”和绝对超然、中立的价值存在:即使所谓“纯科学”的生物学,在十九世纪时也曾以“女人的子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用脑过度,子宫就衰竭了,就

不能生育了”的理论阻止妇女受高等教育；这些“生物学”的“科学理论”正是浸透着社会性别的偏见来达到规范控制妇女的目的。至于历史学和其它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就更不是客观和中立的。这是因为：其一、历史现象和史实不是“透明性(transparency)”的。所谓“透明性”，过去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历史事实、现象是可见的，通过挖掘史料可使其凸现；后结构主义史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历史现象和史实不是“透明”的、人人看来都是一样清晰的物体；看到的史料也不一定是真实史实的记录，所有记载的文本都是一种“再表现(representation)”，都是经过过滤和加工的。其二、即使是个人经验的事实，在复述的时候，也有主体的影响；所谓“经验”，按照斯科特的说法，“经验就是一个主体被建构的过程”，所以经验也不是空白、客观和中性的。其三、即使发掘了一件历史事实，对它的阐释可能因史学家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而异。所以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不承认绝对客观、中立，他们总是首先把自己的身份、学术立场、使用的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告诉大家，而不以真理、客观、公正自命自居。有的学者指出，国外妇女史学者很早就警惕一种“社会性别中立话语”来“软化妇女史的挑战”(鲍克，1989)，那是在社会性别逐渐作为史学界普遍使用的分析范畴时，因为这种“中立话语”容易导致将妇女淹没，不是我们所担心的用“女性视角”看历史容易走极端。这里既有误区，也有焦虑：比如有人混淆“女性视角”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区别，而所理解的“女性视角”不过是以女性的利益、情绪发声，这是缺乏对社会性别理论了解所致；一些女性学者的焦虑仍是迫于学界中男性霸权的压力，唯恐自己得不到学界认同；另外，混淆实证研究与实证主义的界限也是担心的原因之一。

周华山指出，在方法论方面，当今国内社科界对西方十九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依然非常崇拜和流行，认为通过长期的观察、访谈就可以得到一些数据和材料，透过这些数据和材料就可以得到一

些客观的理论,从而去解释社会现象。实证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信理性是绝对的,经验是客观的,具有理性的人能“发现”“客观”的“真理”。其实“发现”也是在建构,“经验”也是主体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实证主义在国外受到很大的挑战,在我国还十分受崇尚。但是,反对实证主义并不是不要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引入社会性别不是不要实证和材料,不但尽量挖掘已有的材料,更要挖掘过去不曾注意的被掩蔽的了关于下属群体的声音,比如口述史的运用。

3、方法:口述——如何听声音

读书研讨班重点阅读和讨论关于口述史在妇女史方面的运用问题。众所周知,由于妇女的生存状况很少得到文字记载,“作为恢复未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非精英人群生活的历史经验的最佳方式之一,口述史在妇女史写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埃米莉·霍尼,1997)在这方面,国内外妇女史学者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讨论集中在如何听到叙述者的声音和怎样对待声音——前者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问题,后者是怎样分析和处理材料问题。与会者一致认识到访谈者和叙述者建立真正尊重平等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学会“倾听”,访谈者不应居高临下地控制访谈对象。在对待声音方面,正如美国妇女口述史两位资深学者的文章所说:“采访者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解释加到她所听到的内容中,必须忠实于叙述者对她们自己生活的阐释,竭尽全力做到从她们的角度来理解。”(苏珊·阿密提支和舍纳·格拉克,1998)妇女口述史不仅要做到由妇女来做研究、做有关妇女的研究和为妇女而研究(to do research by, about and for women),而且要与妇女一起研究(with women)。旅美学者鲍晓兰为这次研讨活动专门撰写了文章,谈她在写《美国纽约华裔制衣女工》博士论文进行口述的经验体会,她从传统认为纽约华人社区家庭稳定、而她又从人口统计中看出妇女自杀率高的矛盾中开始了跨国界的口述

访谈和资料搜寻,特别在广东侨乡的访问,使她弄清了事情真相:由于美国早期移民法中的阶级性——排斥华人劳工不许他们的妻子移民,所以当年留在侨乡的妇女不但经受“寡居”的寂寞、父权制性别制度的压迫,还在家庭中起到撑起“整个天”的作用;而七十年代的女性新移民也“继承”了前辈女性的“遗产”,在华人家庭社区中,受害的妇女因仍在男权中心压抑下无处求助而寻短见。这项研究不但填补了史料,改变了观念;而且也改写了历史。(鲍晓兰,1999)王政、王金玲、杜芳琴、方炼、臧健、韩嘉玲等还分别介绍了关于访谈“五四”新女性、当代性工作者、农村妇女和西北女童及海峡两岸流动婚姻中的女性进行口述研究的经验体会。

4、范例: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简介

这次读书研讨班还精心选择了海外发表的关于中国妇女史最新研究成果(英文),会前重点阅读,会上以读书报告的形式介绍内容和背景,然后集体分析讨论;有关中文的专著和文章,在研讨期间也做了推荐、引介和较充分的交流,收到很好的效果。对苏珊·曼的《珍贵的记录: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王政的新作《中国启蒙时期的妇女——口述和文本的历史》、贺萧的《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卖淫业和现代性》和夏洛特的《旺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中的社会性别:960—1685》等四本书做了重点介绍和讨论。这4本书共同的特点是: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切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妇女生活;运用了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挑战“东方主义”的学术话语,力图表现中国性别文化的正面价值和妇女的能动性。苏珊·曼的书改变了以往汉学家前近代史研究中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中心的视角,而是以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活动为中心,重新解读传统的史料——以大量的妇女的文本(尤其创作的诗词)为主,还有男人的写作(为妇女作的传记、谏文、地方志以及政府文告、表章奏议等),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下,描绘出盛清时期江南地区妇女在文艺写作、娱乐行业、劳动工作和宗教活动等方

面多彩的生活画卷,力图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王政的书最大的创新是把文本的和口述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五四”前后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的兴起和第一代知识女性参与女权运动的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作者用文本材料重构男性知识精英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话语,用“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展现新的女性主体。本书的意义正如妇女史学者高彦颐的评论指出的:“不仅仅局限在它发现了妇女的历史,而且在于它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改写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贺萧的著作是作者十年潜心研究的力作,它既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性别史,又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也是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来研究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关系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最重要的成就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作者从考察、剖析关于妓女的包括游乐指南、传闻佚事、肖像、诗歌、小报流言、官方管理文件、警察审讯记录、对拐卖妇女的报道、中外改革者对卖淫问题的讨论、医生对性病的调查报告……各种材料,认为这些材料都是一种“再表现”,史学家不能对历史的“透明性”进行重构,但可以在收集和分析这些历史的“杂音”中揭示各种社会力量在不同时期对卖淫的不同界定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的意义。她生动地比喻自己的研究不是挖掘和发现“水晶”,更没有发现和画“本质”“客观”、“真实”的“山”的企图;她只是像“剥洋葱”,尽管到最后,里面是空的,但在剥的过程中,了解了洋葱的构造,也就达到历史由“无形”变“有形”,“下属群体”由“不能发声”到发出声音研究历史的目的。夏洛特的新作为中国读者揭开了崭新的妇女史研究领域,她将医学这一看似纯科学、纯生物学的领域与社会性别联系起来,于此可见其开拓意义。作者检视宋明时代七百年间丰富的妇科学传统,利用医学典籍、通俗手册、历史个案等材料,揭示了有关妇女生育、月经、妊娠、临产、性和妇科学话语的演进。书中还论述了“阴阳”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男尊女卑,至少在妇科学中看

不出来这种单一的倾向。书中还具体讲述中医对妇女身体的看法及男女的经、血、脉、气的差异。这是妇女史研究一个崭新的领域，也启发我们去开拓。

(三)接轨·本土化·创新

经过读书与研讨，与会者在初步了解国内外妇女史研究发展、主要理论、概念、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搞好中国妇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议题上来。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打破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方法的单一性，尽快推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推进妇女史学科建设。事实上，我国的妇女史研究历程并不短，最近十几年也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近代妇女史的研究成果累累，郑永福、吕美颐专门撰文《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在会上宣讲，据统计近 20 年就出版专著和教材上百种，论文逾千篇。吕美颐、郑永福合撰的《中国妇女运动 1848—1919》、《中国近代妇女生活》、罗苏文的《妇女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妇联集体编写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等就是重要成果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出的由中央电视台“半边天”制作的《中国二十世纪女性史》系列电视片，将资料与研究、学术与传媒结合起来，代表近代以来妇女史研究和普及的最新成果，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在民族妇女史的研究方面，定宜庄在会上介绍自己最新研究成果——《满族妇女的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和《最后的记忆》，将传统的文献考辨和口述访谈的方法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重写历史上都有很大的突破；特别后一本是专门采访满族老年妇女的经历和历史记忆，具有“填补”和“抢救”历史的双重意义。古代史的研究一直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虽然出版了像《唐代妇女》、《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等著作，但还是以描述为主，缺少理论框架体系的支撑。可喜的现象是最近有了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妇女史理论的开端，

如杜芳琴等人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对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构造及妇女在其中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做了揭示，也在会上做了交流。但真正将中国历史赋予社会性别，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过，妇女史的研究应是兼容的，多种理论方法应该各逞千秋，不是一种理论、一种视角、一种方法。我们既不要食外不化，也不能闭门造车。

在会上，对如何“接轨”，即在继承我国优良的妇女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并进一步创新，展开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应该提“建立中国特色的妇女史学”，“以我为主”；有学者提出应该像老一辈史学家那样，潜心到国外学习历史学理论方法，回到中国消化创立中国历史学，今天也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创建中国的妇女史学（齐文颖）。还有学者说，“本土化”的提法是多余的，因为人在中国或是中国人在海外用国外有用的理论方法做研究时，本身就是在“本土化”了，过度地强调本土的东西实际就是拒绝纳入世界学术潮流。但无论如何，大家还是对引进社会性别理论、口述史方法形成了共识，当场不少人就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路，如对中国家族制度、宋明理学、徽商和晋商、女工、医学和妇女等诸多议题，都找到了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的切入点。还有的学者建议尽快有计划、有组织地整辑妇女史资料，建立资料基地，开展合作研究课题，开辟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等，这些对妇女史学科建设都是基础工作。大家坚信，在扎实工作和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中国妇女史、重写中国通史将不是渺远的理想。

这次读书研讨班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妇女史学者王政博士、鲍晓兰博士合作主持或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玛丽莲·鲍克塞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8)
《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1999)(王政 译)
《重新规划大学蓝图:培养妇女研究博士的前景》(1998)(陈玮 译,待出)
- 2、吉达·勒纳 《妇女史的挑战》(蔡一平译,《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 3、琼·斯科特 《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1988)(刘梦译,李银河等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6)
《女性主义与历史》(1996)(鲍晓兰译,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
- 4、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1989,蔡一平译)
- 5、苏珊·阿米提支和舍纳·格拉克 《对妇女口述史的反思》(1998,郑新华译)
- 6、埃米莉·霍尼 《寻找资料来源——罢工生活:口述史和记忆的政治学》(1997,蔡一平译)
- 7、鲍晓兰 《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1999)
- 8、王政 《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金一虹等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9、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7)
- 10、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California 1999)
- 11、Gail Hershatte: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California,1997)

- 12、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California,1999)